

回憶許舒

科大衛

我在很多年前寫的〈告別華南研究〉一文，記錄了我欠許舒先生的恩惠。直錄如下：

我在 1975 年念完了研究院，回到香港工作。1976 年到中文大學授課。為了上課方便，也因為租金比較便宜，住在大埔墟。當時對民間宗教絕對沒有興趣。我記得當年盂蘭節，從我住的地方轉一個彎便是拜祭的場地，但是我也沒有走進去看一下。我對民間宗教開始感到有興趣，從而瞭解其對鄉村社會的重要性，來自兩方面的影響。

首先，剛到中文大學不久，認識了許舒。香港很多同行都知道，許先生是香港政府的高級公務員，也是香港政府公務員中對新界農村最有研究的一位。許先生是一個罕有的收藏家。他收集了很多文獻，而且絕對願意為學者提供方便，讓學者使用他的收藏。我當時對新界一無所知，但是對地方文獻很有興趣。我還記得許先生向我介紹元朗墟大王廟乾隆年間的租佃糾紛的碑記。在 70 年代後期，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刑科題本還未發表，我們研究租佃問題所用的文獻沒有多少。所以，我看見新界有這類的原始資料，便馬上感覺應該有系統地收集。很幸運，當年在中大擔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是陳荊和教授。陳教授自己曾經把星架坡的漢文碑記記錄和發表，對我的提議很鼓勵。當時我的好朋友陸鴻基也在中大任教，歷史系的前輩，教授香港史的吳倫霓霞博士也願意參加。所以我們三人便組織了香港碑文抄錄計畫。給我們最大幫忙的是一羣熱心的學生。那幾年，尤其是暑假，不論晴雨，他們在香港各地奔跑。我的工作主要是校對，但是也因此帶著碑記抄本走到香港和新界很多廟宇。有關租佃的碑記，我們沒有再發現多才張。不過，碑文抄錄給我初步認識新界農村的機會。

碑文抄錄後來變成了口述歷史計劃。（華南研究會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學步與超越：華南研究會論文集》，香港：文化創造出版社，2004，頁 10-11）

又另一段：

頭一次到廣州看書，我記得很清楚。黃永豪兄當時在中大當研究生，許舒剛買到一批撕爛的地契。我把碎片拿回家像砌圖一樣把它拼起來。許舒再找人裱好。黃永豪考慮可以拿這批材料作碩士論文研究，但是必須找到與資料有關的族譜。我們所以一起到廣州去。上火車的時候還未確定是否可以進廣東省圖書館看書，所以我們說過，假如進不去，便下一班車回香港。到步時，發現譚棟華、黃啟臣兩位先生已經在車站等候我們。安頓後，譚先生帶我們到圖書館去，辦手續很順利。我們很明顯感到中國歷史研究的條件已經改變過來了。從這個時候開始到 1989 年離開中文大學，我每年的假期都有相當時間是在廣州過的。（前引書，頁 20）

回憶多年來受惠許舒先生的學術與收藏，印象尤深，有感而言。

2023 年 7 月 17 日



圖 1、深圳屏山，1990 年。科大衛提供。



圖 2、澳洲悉尼，2023 年 7 月。蕭國健提供。